

LUXUN
YANJIU

3

1983

雲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石
周故遠寄意寒

魯迅研究

軒輊、二十歲時遷石父。

鲁迅研究

1983年第3期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无限的 王士菁 (1)

略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黄侯兴 (5)

鲁迅与夏目漱石 林焕平 (12)

鲁迅和夏目漱石 刘柏青 (22)

鲁迅前期小说与阿尔志跋绥夫 王富仁 (35)

《离婚》与《小公务员的死》的比较分析 林兴宅 (51)

鲁迅与雨果 吕漠野 (63)

鲁迅和茅盾短篇小说的艺术构思初探 刘焕林 李琼仙 (71)

短评

鲁迅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韩日新 (85)

鲁研管窥二则 袁良骏 (90)

青年征文

鲁迅是我师 三联书店 胡靖 (94)

我所理解的鲁迅 江苏仪征县真州一中 彭骥鸣 (102)

青年园地

阿Q, 从原型到典型 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 王宁 (105)

鲁迅作品教学研究

“拿来”与创新

北京日坛中学 龙淑瑛(140)

“长歌之哀，过乎恸哭”

烟台师专 冯乐堂(147)

——《纪念刘和珍君》的感情基调

作品欣赏

在更高的阶梯上再现自己——试论《朝花夕拾》

王文彬(150)

学人采访

记林辰

本刊记者张梦阳(165)

札记

伦勃罗梭：在艺术中“发现”疯狂

余凤高(171)

小说琐谈(二则)

杨 义(177)

书评

鲁迅文献研究的一个收获

陈鸣树 潘颂德(181)

——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释·解说》

三种《鲁迅全集》漫议

高鸣鸾(186)

编后记

(190)

大型鲁迅研究论著资料复印汇编(全国解放前部分)

征订启事

(191)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无限的

王
士
菁

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轮廓，也是鲁迅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不仅鲁迅是如此，和鲁迅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基本上也是这样。瞿秋白是这样，郭沫若是这样，茅盾是这样，还有许多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也都是这样。

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吧。曾经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土地上，并和广大人民战斗在一起的作家和艺术家，在那样可诅咒的地方和可诅咒的时代，能有什么光明出路呢？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势所必然、不可逆转地走向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艰苦的复杂的然而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个作家或艺术家走上这一条道路，他们的出发点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热爱和自己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祖国，和生活在祖国土地上的人民。当青年的鲁迅还没有弃医从文，没有下

定决心把文艺作为改造国民思想的武器的时候，他就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表达他对于当时处在风雨飘摇中的祖国和陷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无限焦急的心情，立下了为争取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而献身的崇高志愿。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流传最广最早的鲁迅一首诗：

《自题小像》中所表达思想和感情。这种热烈的痛切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感情不仅在这首小诗中表现出来，可以说，在鲁迅早期所有的作品中也都深深地蕴藏着这种思想和感情，甚至在他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论文《中国地质略论》中也强烈地表现出来。如果在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心灵深处没有这一点光和热，没有这种最朴素最纯真的爱国主义的感情，他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也不可能

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那就更不用说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①“爱”是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的根源的。鲁迅又说过：“创作是有社会性的”。②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这就是作家创作的“社会性”。

在早期的鲁迅作品中，他认为有各种不同的爱国主义。他赞成革命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和被压迫人民寻求解放的思想密切联系起来的，如他在《摩罗诗力说》等文章里所赞扬的。他不赞成狭隘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对于别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命运采取漠不关心甚至嘲笑的态度。这是鲁迅所反对的。他反对在清末颇为流行的那种“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痛斥印度波兰之奴性”的盲目自大狂；他更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兽性”爱国主义。他认为这是赤裸裸的侵略和掠夺，不管侵略者和掠夺者对于被侵略者和被掠夺者采取什么样的欺骗和借口，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为着揭露那些侵略者和掠夺者践踏广漠美丽的祖国和奴役中国人民，拿起了战斗的笔来，杂文就是他终生使用的一个战斗武器。

为着寻求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解放，鲁迅在文艺领域里，“别求新声于异国”，向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寻求友军；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探索 and 追求。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在早期（“五四”以前），以至于在前期（一九二七年以前）都带上了民主主义的色彩。这一些思想上的探索 and 追求的痕迹，在早期的杂文中，和“五四”时期的一系列杂文中都深刻地反映出来。鲁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发展史，从古代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十九世纪的欧洲斯蒂纳、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学说，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于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接触得更早些。对于西方这一些错综驳杂的“新学”，在他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是不可能去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如大家所熟知的，早年的鲁迅对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曾经加以热烈的赞扬，而在后来才感到他的“渺茫”。

鲁迅最初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的态度，当他还没有采取

①②《而已集·小杂感》。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的时候，也可以说是采取一种“兼收并蓄”或“兼容并包”的态度的。不论好坏，一概“拿来”，为我所用。这在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好的作用，促进的作用；同时也起过不好的作用，阻碍的作用；但总起来说，归根结底，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鲁迅最初接触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的时候，这种哲学思想在西方已经走向没落和反动，而在思想文化处于落后状况的近代东方，在鲁迅寻求“新学”的过程中，却被误解为新鲜的事物或甚至是进步的东西。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鲁迅是把这一些“新学”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来运用的。当这一些思想作为一种“思想资料”被吸收入鲁迅思想里面，并用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特别是反对封建主义复古思想时，在实际斗争中形成了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鲁迅思想时，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特色，这就是深刻地反映在鲁迅早期和前期杂文里的战斗的风格。

然而，时代毕竟是在前进了。生活在、战斗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仅凭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是不足以战胜敌人的。要战胜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还暂时居于优势地位，因而在思想文化上也居于统治地位（虽然其本质是腐朽的）的敌人，那就要必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大致说来，从“五四”时期开始，鲁迅在他的战斗生涯中就在寻找这样的武器，在1924—27年大革命时期，他更进一步地积极寻找这样的武器，如反映在《坟》的《题记》（1926年10月）和《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的那样“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的思想情绪，和“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自我解剖精神，那样的艰苦卓绝的探索 and 追求。正是由于经过了漫长的艰苦的探索 and 追求，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也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由于事实的教训”，他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新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并且已经得到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从《三闲集》和《二心集》开始，在鲁迅杂文中出现了不同于他前期杂文的新的风格。正是由于在他的思想发展后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必胜信念是更加坚定了，对于祖

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更充满着信心，因此，在他的杂文中，对于反动统治阶级腐朽本质的揭露，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分析，对于买办资产阶级奴化思想的批判，更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达到鲁迅杂文创作的新的巅峰。

但是，也有人认为：鲁迅在“投共以后”（意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引用者），他的杂文“给人的总的印象是搬弄是非，罗罗索索”，是“时代的感情偏见”，是“他创作力的衰竭”，等等。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这种看法似乎表现了这位论客本人可能倒有一点“感情偏见”吧。

在后期的鲁迅杂文中，充分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个思想武器，在已经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鲁迅手中的运用，已达到了纯熟的地步。由于鲁迅后期杂文的出现，以“五四”为起点的现代中国的新文学也达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峰。

这也充分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在创作思想上，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1983年3月2日

鲁迅与《马克思读本》

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鲁迅曾指导许广平学习日文本《马克思读本》。该书共分十讲，二五九页，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四月东京资文堂出版。编者神永文三，日本大正和昭和初期的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曾编辑《大众运动》（一九二一年）、《局外》（一九二二至二三年）等刊物，译者有《中日事变经济史》、《人口论》、《富国论》、《社会学通俗教科书》等。神永文三是日本著名社会思想家、《资本论》日文本译者高畠素之的学生。他编写《马克思读本》时，曾参考高畠撰写的《马克思十二讲》和高畠翻译的考茨基所著《资本论略解》。

（斯 力）

略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 黄 侯 兴 ——

鲁迅的历史观，同他的思想发展一样，有一个从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在他后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自觉地克服了前期过于夸大个人作用的唯天才论和英雄史观，以及过分强调精神作用的概念论的影响。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鲁迅后期最犀利的思想武器。鲁迅后期杂文之所以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战斗风格，应该说是同他自如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武器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恩格斯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①。鲁迅虽然不是专治史学的，但他非常重视历史，他对于旧中国没有一部象样的历史著作经常发出感慨。他认为“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②。他期望中国能有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问世。鲁迅研究历史，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坚持借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原则。“‘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③。这“现在”，是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出发，是为了实现现在的革命任务的。如同马克思所说，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④。例如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鲁迅在广州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用讲历史的方法，影射蒋介石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大搞背叛革命的罪恶活动；并借赞扬曹操针对东汉末年的“党锢”，力倡通脱，废除固执，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信》1890年8月5日。

② 《书信·330618致曹聚仁》。

③ 《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

④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

敢于“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的进步措施，巧妙地揭露了蒋介石大搞“清党”活动的专制独裁政策。同时借分析古人那时“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以寄寓对革命人民的要求，即在国民党反动派独断专行的“乱世”，不要“超于尘世”，“不能忘记‘死’”。他后来在一封信里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①这一句话，是鲁迅对自己研究历史坚持古为今用原则的最好的注脚。直到晚年，鲁迅仍然坚持这个原则，表示要通过历史的批判“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②。

历史是一面镜子。鲁迅要求我们珍贵前人留下的历史经验。他从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联系中洞察到现实社会的种种“昏妄举动，糊涂思想”，在历史上都“早已有过”^③。为此，他建议大家读正史外，要多读野史和杂说，尤其是宋朝、明朝史。他指出，看看明末的野史，对照一下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实行的反革命“围剿”，“则手段之相象，他们自己也觉得的”^④。

唯心主义者杜撰了许多所谓“圣贤”、“天才”创造历史的神话，作为反动阶级统治和奴役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因此，彻底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成为鲁迅后期杂文的一项重要内容。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⑤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梁实秋等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吹捧为中国的“代表”，高叫着要“崇拜英雄”、“尊重天才”，“一切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创造”，同时诬蔑人民群众“永远是愚蠢的”。鲁迅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要紧的”^⑥；至于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则是社会的痼疽，“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⑦。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

① 《书信·281230致陈浚》。

② 《书信·350104致肖军、肖红》。

③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④ 《书信·340522致杨霁云》。

⑤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⑥ 《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⑦ 《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者？鲁迅根据大量的史实，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① 鲁迅后期是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的。一部人类文化史，深刻地记录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经过。讲到汉字的起源，鲁迅批判了“仓颉造字”说。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就已指出：“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后来他在《门外文谈》一文中，更是深刻地揭露了后儒们把仓颉描画成“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妄图垄断文字和文化的险恶用心，指出“文字在民间萌芽”。讲到文学艺术，他认为“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文人的作品往往要从这些民间的作品中汲取新的养料，特别是当旧文学衰退时，几乎都是摄取民间文艺的精华“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就是鲁迅对文字、文艺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推及一切文物，诸如建筑、烹饪、渔猎、耕种、医药等等，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智慧和经验的结晶，“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②，并非什么“极少数天才的创造”。历史文物、古迹和文献，是用来向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生动的实物史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重视历史文物。他说：“我们要保存清故宫，不过不将它当作皇宫，却是作为历史上的古迹看。”^③ 鲁迅尤其重视革命文物和文献。他把先驱者的遗文，称为“革命史上的丰碑”，称赞革命烈士的诗作是“有别一种意义在”，是“属于别一世界”^④，它将激励、教育着后来者。鲁迅这些见解，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光芒。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不否认天才、英雄和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鲁迅也认为，“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变革中国社会现实中所肩负的重任。他要求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

① 《写在〈坟〉后面》。

② 《南腔北调集·经验》。

③ 《书信·331224致黎烈文》。

④ 《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

毅力”。他们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投身到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去，即使是逆水行舟，也始终认准“向前”的大目标，“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①。

马克思曾这样表述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②鲁迅也反对把人“神化”、

“神圣化”，憎恶中国儒家的“完人”思想。“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③。鲁迅坚决反对这种“求全责备”的态度。因为“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④。鲁迅同意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在《自反录》一书中所说：

“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这里提出了一个“趋向苟正”与“趋向苟差”的论人标准。三十年代初，林语堂等人借明末袁宏道的小品文提倡“性灵”。鲁迅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歪曲了袁宏道的本质。“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这更重要的一面，即“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⑤。鲁迅既反对徐志摩诸公把印度诗人泰戈尔“神化”，也反对林语堂等人把袁宏道画歪。他主张尊重历史的真实，对古人、名人都只能观其趋向之大体。“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⑥。

正由于反对把人“神化”，鲁迅对于“名人”和“名言”的看法也是历史的、辩证的。鲁迅注意到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⑦。鲁迅以

①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②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③ 《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④ 《译文序跋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⑤ 《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

⑥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⑦ 《书信·351029致肖军》。

为这是把名人当作偶像了。因为探究起来，名人的得名，是靠了“那一种学问或事业”，他们只是在某一学科或某一事业的范围内才成为专门家的。但由于传统的习惯势力，社会上多崇拜和迷信名人，“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也由于名人自己吃捧，被“崇奉所迷惑”，也就忘乎所以，“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因而出现许多笑话和谬误，贻患无穷。这就是鲁迅所批评的“名人的流毒”。鲁迅提到考科举的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时，本和天下国家无关，但一登第成名，他们却修史、衡文、临民、治河；清末之际，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等。鲁迅幽默地问：“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说到章太炎，鲁迅称他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动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三十年代初，章太炎在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学生请他讲国学，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鲁迅因此夸奖“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由于名人自视不凡，爱发议论，然而多是信口开河，言语多悖，鲁迅因此提醒我们不要轻信名人的所谓“名言”，对于名人的“专门以外的纵谈”，要加以“警戒”①！

“知人论世”。鲁迅一向强调要历史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既不可“苛酷”，也不要把古人古事现代化，不能离开（更不能超越）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和习惯。他说：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②列宁在评论黑格尔哲学史时，高度称赞了黑格尔的“严格的历史性”，指出黑格尔“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的名下”③。鲁迅前期提出的“不思近世”的观点，后期所说的“顾及全人”、顾及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状态”，探究其实质，同样具有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

① 《且介亭杂文·名人和名言》。

②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③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

对待古人、前人，人们习惯于采用“捧杀”和“骂杀”两种办法。这是鲁迅所坚决反对的，因为无论是“压下去”，还是“捧起来”，都是反历史科学的。一九二九年四月，浙江省建设厅举办一个物资交流展览会——“西湖博览会”，内设一个革命纪念馆，博览会开幕前曾在报纸上公开“征集革命纪念品，以资陈列”。奇怪的是，革命先驱者邹容却被列入“落伍者丑史”的目录中。鲁迅立即撰文给予拨正，指出：“他在明清时，做了一本《革命军》，鼓吹排满，所以自署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后来从日本回国，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里了，其时盖在一九〇二年。自然，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义，当然也不知道共产主义。但这是大家应该原谅他的，因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会才成立。”①

鲁迅不独肯定了邹容、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先烈，对于清末时期变法维新的“趋时”的人物，也没有采取一概排斥和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充分注意到了“严格的历史性”。说到康有为、严复，鲁迅指出：“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稀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②尽管鲁迅批评过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的“光复旧物”的狭隘排满情绪，但对他们那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图强爱国的精神，同样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③正是有了这些自鸦片战争

① 《三闲集·“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② 《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③ 《准风月谈·重三感旧》。

以来起着桥梁作用的知识分子的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近代中国才可能从变法维新、排满革命到后来走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道路。所以鲁迅直白地说：“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①这种赞美，鲜明地体现了鲁迅评论“一些过去的人”所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当然，历史主义并非无原则的迁就。好就说好，坏就说坏，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的原则立场。刘半农和鲁迅是同辈，鲁迅对刘半农在《新青年》时期的战绩是充分肯定的，后来刘半农病故，“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他为此表示惋惜^②；他对刘半农不满，是他留学法国归来，当上教授，“据了要津”以后。所以鲁迅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③鲁迅爱刘半农“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而憎恶他后来的倒退，以贵族老爷态度对待青年，成为“作古的名人”，死后还可能被权势者封为“复古的先贤”^④。这些肯定和批评，是鲁迅高度的原则性和深刻的人民性的体现，所爱所憎，了了分明。

总之，鲁迅后期历史观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他的许多精辟论述，发人深思，充满着智慧和力量，闪耀着战斗的唯物主义的光辉，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从中获得教益。本文只大略陈述鲁迅后期历史观之一二，谨此作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纪念。

① 《准风月谈·重三感旧》。

② 《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1）》。

③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④ 《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鲁迅与夏目漱石

林 焕 平

一

夏目漱石(1867年—1916年)生于东京,是夏目家五男三女的末子,儿女多,不受欢迎,出生不久,即让给旧货店老板做养子,两岁时,再转让给盐原昌之助为养子。十岁,回到出生家。他是小说家,文学理论家。他1903年写处女作《我是猫》,后发展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者。曾留学英国,对英国文学研究,造诣甚深。回国以后,先任高等学校讲师。1907年3月,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争聘他为教授,他都拒绝了,却入东京朝日新闻社任记者。当时,在社会上,教授的地位是崇高的;记者是被人所贱视的。但他宁舍教授而取记者,这表现出漱石的意气轩昂的气概。他进朝日新闻后,开辟《朝日文艺栏》,任主编(1909年11月25日—1910年10月23日止)。1911年,由博士会推荐,给他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他也拒绝了。他不要过恬静的、书斋的学者生活,而要过战斗的、专业作家的生活。他不满日本模仿西洋自然主义文学,他青年读汉学,力求超越过中国的《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英国文学,以解释文学的普遍性。漱石有东洋人的骄气。他在伦敦街头被西洋人目为可怜的中国人,非常愤慨。他认为西洋文明的失败,起因于贫富悬殊太大。所以他认为“马克思学说的产生是必然的。”他赞扬惠特曼为共和国诗人,赞美实现了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共和国人民所必要的是独立精神。将自由的个人与个人结合起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同志爱,明治维新却未能实现独立、自由、平等、博爱。自然这只是资产阶级开明派作家的理想。漱石自己说:“我一方面从事于诙谐文学,同时又以维新志

士的激烈精神，赌着生命的死生，从事文学。”二十世纪初年，漱石深受尼采的影响。他是从个性解放的角度欣赏尼采。他对尼采有一定的距离，有时又有揶揄的调子。在文学上，他固然受过日本《源氏物语》等的影响，但受莎士比亚、斯威夫特、美列笛斯的影响更深。漱石最厌恶为利害而狂奔的世界。他说他自己站的是真理的世界。他没有二叶亭四迷那样的锐敏的思想，但他憎恨资本家，同情人民疾苦。长冢节的《土》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惨苦，漱石就给它写《序》。他反对明治维新的唯西洋的马首是瞻的模仿论。他说：“日本终归是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性，不能尽是模仿西洋。并非只有西洋是模范，我们也可以为模范。”^①他是激烈的维新战士。但他又有厌世思想。这是他对日本现实的绝望。在他的晚年，刚碰上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他对此表示出为对其他外国事件所没有的关心。他说日本人民都同情革命党。革命来势之迅猛，真是不可想象。漱石头脑里的中国形象，是孔子的国家，李白、杜甫的国家。辛亥革命的事态，真是不能想象。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可以《草枕》为代表。他的艺术观是以他的人生观为基础的。他说：“形式是内容的形式。并非为了形式而制造内容。内容变了，作为外形的形式必变。”他一生的艺术创作，实践了他的关于艺术的理论原则。

二

鲁迅（1881年—1936年），生于浙江绍兴。少年时期尝尽家庭破落的酸楚。曾在南京学矿。1901年赴日本留学，在《自题小象》里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后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在二年级，以“幻灯事件”，愤而退学。日本近代文学先驱者之一，又是俄国文学优秀介绍者二叶亭四迷到俄国去，他在《送别会上的答词》里说：“……世界上各国人民都不需要战争。避免将来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即是，即使政府要战争，人民不要战争，它就没有办法。”他认为疏通人民的意志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文学”。这个清醒的思想也

^① 夏目漱石：《战后文学界的趋势》。

影响了夏目漱石，同样，也会给予影响于鲁迅。鲁迅认为改造国民性的最好的手段，就是文学。所以他弃医就文。鲁迅在日本的时候，正是夏目漱石在文坛上最红的时候。这个时期，也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极盛期。夏目漱石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不满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鲁迅也是如此，他不满自然主义的作品，却爱读漱石和森鸥外。鲁迅38岁（1918年，漱石死后二年）写处女作《狂人日记》，一鸣惊人，成为我国近代文学先驱者。鲁迅和夏目漱石有一点偶然的奇缘。1908年，鲁迅兄弟迁到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号之七居住，这是许寿裳给他们租的。约半年之前，这座房子恰恰是夏目漱石居住过的。漱石在这屋里写了他进朝日新闻社之后的第一篇作品《虞美人草》，由于房租太贵，他生气了，才搬家的。鲁迅在这所房子里开始从事文学活动。鲁迅和漱石，都是代表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象征性的存在。这个偶然，是有趣的巧合。漱石赞美惠特曼。鲁迅在早期的力作《摩罗诗力说》里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由于明治维新，日本已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因此，漱石憎恨资本家，厌恶资本主义制度。鲁迅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他的政治态度和革命精神，与漱石迥然不同。他在日本，就参加革命组织光复会。回国后，在绍兴教书，适值辛亥革命爆发，他就率领学生积极参加斗争。而且在《阿Q正传》、《药》等作品中，对辛亥革命作了深刻的描绘。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他应南京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前往该部工作。旋迁北京。在此后若干年间，他研究古代文学，搜集、校勘和抄录碑刻古籍。1918年，38岁，始发表处女作《狂人日记》，一举成名，此与漱石，亦颇相似。二十年代前期，在北大、北京女师大等校任教。他在《高老夫子》、《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中，揭露北洋军阀的教育腐败，正人君子的虚伪险恶，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正气凛然，令人起敬。后来被迫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去。1927年初，奔赴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任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不久，“四·一二”，“四·一五”大屠杀勃发，血洗羊城，他抗议国民党叛变革命，捕杀学生，愤而辞职。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里有一个细节，描写从枕头底下拿出手枪来对付前来威吓他的国民党特务。增田说这是鲁迅亲口告诉他的。